

俄罗斯

对于当代俄罗斯左翼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除了其理论本身的旨趣，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它已经成为理解和把握俄罗斯历史道路与社会现实的重要视域和方法。学者们基于新的时代状况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民族历史命运之间的内在关联，寻求对现实发展道路的具体化阐释，凸显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在为民族复兴寻求信念支撑与具体化纲领的诉求下，近年来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社会、经济、政治等相对具体的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了更为充分的发展。临近“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百年的时空跨度为左翼知识分子反思苏联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域与阐释维度。

一、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学术活动与著作

（一）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有关的学术活动

2016年4月6—8日，召开了题为“西方文学中的俄国1917年革命”国际学术会议。会议涉及：“俄国革命在西方的文学自觉”、“革命美学与政治”、“革命：图像和判断”、“西方的革命运动”等主题。2016年4月28—29日，俄罗斯科学院哲学史研究所举办了“战争与和平的哲学：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

70周年”。会议包括一系列主题报告：卡拉-穆尔扎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俄罗斯哲学：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赫鲁斯塔廖夫的《人本主义：世界和平的实质》；舍甫琴科的《西方反对俄罗斯历史记忆的信息化战争：伟大的卫国战争》。2016年6月14—15日，举办了“伟大的卫国战争——苏联人民历史中的英雄和悲惨一页”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从文学、艺术、历史、经济等领域全方面反思卫国战争的意义。此外，围绕着纪念卫国战争胜利而举办的大型国际科学实践会议还包括：“不断变化世界中的公民个体：从抵抗到创造性活动”、“伟大的卫国战争：俄罗斯与世界历史和历史的记忆”、“伟大的卫国战争：跨学科的反思”等。

2016年4月22日，召开了第六届“列宁在当代世界”国际会议。波波夫在报告《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中指出，每一个国家政权都需要稳定的政权组织形式，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和实质意味着最广泛、普遍的民主政治，构成了经由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现实路径。普罗托波波夫在报告《列宁与黑格尔辩证法》中指出，就实践与抽象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而言，更重要的不是其理论学说而是它的实际应用，就此而言，列宁的思想具有政治实践意义。列宁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了黑格尔辩证法从抽象到具体的现实路径，将社会存在及其历史发展作为抽象概念的辩证基础，俄罗斯的未来将取决于对列宁现实的、革命的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卡尔波夫在报告《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1907年前夕社会民主党人的土地问题》中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认为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土地问题被庸俗化了。列宁分析了俄国土地变革的实质和经济基础，并具体剖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各种观点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就土地国有化问题上各派主张的实质与错误。就经济而言必须实行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列宁的土地国有化思想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会议报告还包括：奥戈罗德尼科夫的《关于人类存在的自由与意义》；卡泽诺夫的《列宁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秋利金的《列宁新型政党理论的急迫性》；杰格捷列娃的《列宁的国家自决权原则》；格拉西莫夫的《列宁关于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

2016年12月18—19日，国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协会、俄罗斯社会主义科学家联盟等机构举办了“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突破”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旨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发展极限与未来趋势，

着重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具体表现方式，即当代“集体资本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及其限度。与会学者认为，金融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潜在的连续性是毋庸置疑的，一些国家突破日益加深的社会不平等与资本主义威胁，转向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改革，因此需要加强研究社会主义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突破路径，为一些国家建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借鉴，揭示社会主义未来的可能模式与不同国家工人运动所存在的现实困境，发展全球社会主义批判理论。具体地说，会议涉及如下主题：（1）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美国法西斯主义的加强；（2）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深；（3）民族国家与全球化利益之间的矛盾，单一全球监管调节的不可能性；（4）资本主义：本质、趋势和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方法问题，全球资本主义的水平和趋势，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极限；（5）为国家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奋斗的工人运动，即中国、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与障碍，西欧劳工和共产主义运动、俄罗斯和乌克兰改革等。季亚琴科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当代共产主义运动》报告中指出，列宁将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将民族解放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民众基础而批判国际主义，这一立场在今天需要重新审视，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必须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能够获得真正的革命性，因而左翼阵营需要确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只有通过反对资本主义及其财产私有制，才能够在根本上瓦解帝国主义。

2016年5月14日，在莫斯科举办了“社会主义：理论、实践、21世纪发展趋势”国际科学与实践会议。会议的主题报告包括：布拉吉谢夫的《社会主义更新：俄罗斯形成与发展的条件、主要特征》；苏比达的《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与必然趋势》；舍韦卢哈的《社会主义创新发展问题的建议》；索科洛夫的《作为俄罗斯民族意识的社会主义复兴》；普罗斯库林的《社会主义在现代世界实践的多种方案》；多布罗霍托夫的《美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复兴》；兹米耶夫斯基的《人类文明的社会主义或毁灭：不是口号，而是科学合理的方案》；卢德涅夫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要素财产形式的确立：现代化的解决方案》；加古诺夫的《普及教育作为俄罗斯社会主义复兴的前提条件与综合系统》；博伊科的《创新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科学基础与数学解释》；科斯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研究机构》；卡泽尔斯基的《21世纪国民经济与社会管理》。

(二) 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有关的学术著作

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包括：科马罗夫的《唯物主义和工人阶级》；索洛波夫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博尔希的《俄罗斯的真理的哲学：20 世纪的经验》；沃伊的《哲学和全球危机》；巴兰金的《卡尔·马克思和 21 世纪〈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错了吗？》；沃耶伊科夫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学者们的辩论》；泽罗夫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俄罗斯：21 世纪的视角》；戈卢比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Ю. 伊万诺夫的《新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的解释》；H.H. 札尔达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中的利益范畴》；B.C. 格里岑科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后工业理论》；M. 戈尔布诺夫的《黑格尔——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A. 茨韦特科夫的《马克思主义是方法》等。

有关社会主义著作包括：M.M. 达列耶夫的《伦理学史：社会主义（道德和经济）》；B.T. 梁赞诺夫的《（非）现实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对世界经济和俄罗斯的后果》；И. Г. 拉韦雷契娃的《俄罗斯的选择：革新的社会主义还是崩溃？》；A. Д. 戈拉多夫斯基的《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什么是保守主义？西欧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Л.С. 别利亚耶夫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素》；A. 科拉斯诺夫的《共产主义和哲学》；H. 皮利片科的《21 世纪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宣言》；A. Д. 阿吉莫夫等人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A. 瓦谢尔曼的《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卡拉-穆尔扎的《反苏维埃的方式》；Ю. 瓦季莫夫的《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正义》；A. 舍布洛夫的《发达社会主义时期》；论文集《东欧国家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特点和结果》等。

有关俄国革命与列宁研究著作包括：A. 瓦西里耶夫娜的《世界革命时期（1917 年 2—10 月）》；B. 加林的《1917 年：历史的推动力（纪念俄国革命一百周年）》；E.A. 西科尔斯基的《革命的日子（1903—1920）：事实、解释和思考》；A.A. 布勃利科夫的《俄国革命：亲历者和参与者的印象和思考（1917—1918）》；И. Ф. 纳日温的《革命笔记》；П. 巴拉耶夫的《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关于俄国革命的真理》；И. Л. 索罗涅维奇的《革命的神话》；A.B. 舒宾、H.B. 斯达利科夫的《1917——俄罗斯革命的秘密》；B.E. 尚巴洛夫、E.H. 恰夫其泽的《列·托洛茨基：世界革命的秘密》；С.И. 阿尼奇科娃的《列宁的秘密：编辑的回忆（1917—1926）》；Г.А. 苏巴托维奇的《列宁个性的秘密：人民的拯救者还是帝国的毁灭者》；B. 洛吉诺夫的《列宁在 1917 年：在可能的边缘》；A. И. 苏别达的《关于列宁：21 世纪社会主义及俄罗斯与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B. 布

申的《普京反对列宁》等。

有关苏联研究著作包括：A. 奥斯特罗斯基的《苏联解体的方式：权力的秘密》；卡拉-穆尔扎的《苏联的解体：谁之罪》、《苏维埃文明》、《苏联的遗产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H.A. 若马尔托维奇的《卫国战争时期哈萨克斯坦的工业合作社：1941—1945》；M.A. 科热维娜的《苏联解体：历史—法学问题》；戴维·科茨的《俄罗斯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道路：苏联体系的灭亡和新的俄罗斯》；M. 谢利维诺夫的《卫国战争的历史》；B.A. 安东诺夫的《卫国战争笔记》；A.И. 卢申、A.П. 伊萨耶夫的《20世纪60—80年代的苏联国家和社会》；B. 科日诺夫的《斯大林镇压的事实》；B. 库兹涅契夫斯基的《斯大林和苏联政治史中的“俄国问题”：1931—1935》；B. 梅金斯基的《苏联的战争和神话：1939—1945》；Ю. И. 戈拉乔夫的《斯大林、领袖和导师》等。

其中，最为重要的著作如下：

1. 沃耶伊科夫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学者们的辩论》一书中讨论了近年来俄罗斯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争议性的问题，对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研究及其学术实践进行了总结。^① 沃耶伊科夫认为，当今俄罗斯知识分子基本可以划分为三种思潮：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复制；苏联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残余；寻求民族解放的斯拉夫主义。但就俄罗斯独特社会历史境遇与民族文化状况而言，其中任何单一思想资源都无法在根本上解决当下的困境，因此需要将西方思想的成就、苏联经验以及民族国家认同综合为新的思想基础。本书包括五章内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了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遗产及其与托洛茨基的争论、新马克思主义及其创始人；“1917年革命：理解的悖论”涉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与历史分期、国家资本主义与苏联、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的必然性、斯大林主义与极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讨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市场与伦理价值观、无政府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的移入与经济效益的冲突；“经济理论：经济改革与工人”涉及俄罗斯政治经济命运、市场经济转型、社会与劳工问题与征程；“俄罗斯：过去与未来的现代化”重要涉及俄罗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

2.《马克思主义与多重理性》一书旨在研究和发展马克思的“内在批判”

① Воейков М.И. За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марксизм. Полемика с учеными. URSS.2016.

理论。^①作者在梳理西方哲学思想史的基础上引入了纯粹理性主义的多重性概念，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成熟的前提条件和思想过程，即马克思、恩格斯经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学说所完成的辩证法革命。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不仅强调构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之砖，同时也揭示了何处以及为什么仍未完成，为我们提示了重要的研究领域。这本专著总结了发达工业社会理论在苏联和西方国家的不同模式或图景。

3.《马克思主义：社会和政治理论导论》一书力图克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②作者认为，在今天亟待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展开批判性分析，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克服苏联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科学以及人文教育中定性研究的影响，首先需要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还原与阐释。本书共分八章内容：第一章“经典马克思主义”涉及生产方式、资本主义、阶级、国家、革命、列宁主义等基本问题；第二章“东欧修正主义”主要涉及科夫斯基、市场社会主义、布达佩斯学派、苏联的60年代等；第三章“1968年”涉及战后的变化、凯恩斯主义、消费与反叛、异化、毛泽东思想、民主与群众运动、意识形态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分析、景观社会、新托洛茨基主义；第四章“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涉及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殖民资本主义、资本过度积累、资本主义和市场、新自由主义；第五章“什么是苏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和非正式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经验分析”涉及俄国革命的期望与现实、左翼对列宁的批判、扩展苏联体制、俄罗斯新资本主义；第六章“从阶级到政党”涉及历史与阶级意识、知识分子和革命等问题；第七章“资本主义、所有制与社会主义”涉及所有权问题、垄断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及其失败等问题；第八章“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涉及国家以及国家的形成、帝国和国家、列宁联邦制、反犹太主义、新的民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等。

4.《历史哲学视域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人类以及俄罗斯历史上的本质与地位》^③一书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的起源、性质和

① Коряковцев А., Вискунов С. Марксизм и полифония разумов. URSS. 2016.

② Б. Ю. Кагарлицкий: Марксизм: Введение в социальную и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теорию. Москва: URSS: Ленанд, 2016.

③ Семенов Ю. И. Политарный (“азиатский”) способ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ущность и место в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и России. Философск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URSS. 2016.

作用问题。作者梳理并分析了 20 世纪 20—30 年代、60—70 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领域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所展开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两场争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反亚细亚生产方式”之间争论的核心在于，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是否具有普遍性，除了作为第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存在于公元前 4000 年到前 2000 年的东方国家）之外，在人类历史上是否存在其他类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两场辩论试图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解释具体国家的现实历史运动，体现了历史线性发展图式与历史多元论之间的对立。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形成与本质（亚非地区传统社会结构类型之一），作者认为在俄罗斯历史上存在两个阶段，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形成了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统一俄罗斯国家建制，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形成了非亚细亚生产方式。作者并未仅仅局限于苏联时期非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起源，分析了 20 世纪 90 年代民主革命以及当前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性质。

5. 巴兰金的《卡尔·马克思和 21 世纪〈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错了吗？》一书讨论了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当代意义。^① 巴兰金指出，卡尔·马克思批判性反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学说，宣布工人阶级积极争取自身权力的历史必然性，将经济与政治有机地连接起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知者。在 19 世纪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只是加剧了欧洲和俄罗斯的革命高潮及其影响力。苏联时代马克思主义普及的高峰期是在卫国战争胜利后。在 21 世纪不仅在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恢复了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

6. 《21 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俄罗斯的经验评价》一书中专门探讨了社会主义在苏联时期的矛盾与经验，在此基础上对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及其现实图景进行理论分析。^② 作者将自己归于当代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坚持马克思的方法论立场，建议放弃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乌托邦的观念，同时拒绝右翼学者对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性质以及苏联实现发达社会生产力标准的否定，认为苏联实现了建立在劳动者自我管理基础上的公有制与社会化劳动。并

① Баландин П.К. Карл Маркс и Капитал в XXI веке. В чем ошибался родоначальник марксизма? URSS.2016.

② Эпштейн Д.Б. Социализм XXI века: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и оценки опыта СССР. URSS.2016.

且指出，对于苏联某些判断，如“国家资本主义”、“党—国官僚统治”、“国家领导阶层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对抗性矛盾”等是值得商榷和讨论的。在第一部分“什么是社会主义”中，作者要求在历史性反思和变革苏联时期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基础上，以国家公有制形式及其社会生产的民主化重新定位并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其所存在的社会主义不同模式。将20世纪30到80年代苏联称为“早期社会主义”，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模式在20世纪出现和发展的现实条件，批评了否认苏联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国家公有制的观点，并表明社会生产的民主化程度是社会主义模式固有的特点，这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存在的。作者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党—国官僚主义对劳动者阶级的剥削这一观点，认为其机构组织体系有助于维护对工人行动的统一指挥，但在本质上党和政府权力的目的在于实现工人阶级利益。实践证明，尽管苏联实施专政统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垄断地位，其作为某种消极的政治民主形式对苏联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诉求的历史内容与具体化结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俄罗斯学界重视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研究。2016年再版了罗森塔尔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一书。^①罗森塔尔是苏联时期著名的辩证法、社会哲学、俄罗斯哲学史研究学者。他重视对社会矛盾及其冲突的研究，坚持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法原则分析复杂的社会现实系统，先后出版了《唯物辩证法》(1937)、《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1951)、《辩证逻辑原则》(1960)、《列宁的理论概念及其现代发展》(1961)、《列宁帝国主义与革命辩证法》(1976)等著作。《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一书在苏联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从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对《资本论》中所贯彻的辩证法展开了研究。罗森塔尔反对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的研究工作仅仅理解为放弃哲学而转向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论》所揭示的不仅是经济规律，而且从哲学意义上揭示了社会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来的百年历史证明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过渡性质。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客观发展的辩证法及其在辩证法规律和范畴中的再现；第二部分即主观思想及其客观真理的运动形式的辩证法。《辩证法与唯物主义：逻辑综合》一书与刚刚出版的《辩证逻辑》

① Розенталь М.М. Диалектика “Капитала” К.Маркса. URSS.2016.

构成了连贯的整体^①，总结了哲学与科学历史和现实的统一的分析结论，澄清了辩证法在哲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辩证法理论发展的历史以及对它的一般逻辑、结构的阐释。著作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哲学、历史与辩证逻辑的本质”；第二部分“作为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辩证法”。

2016年出版了苏联时期哲学家温斯坦（1885—1938）《黑格尔、马克思、列宁：辩证思维的发展阶段》一书，旨在研究上述三位哲学家辩证思想的共性与差异及其辩证思想发展的三个决定性的历史阶段。^②第一部分论述了作为革命逻辑的辩证法，包括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意义以及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黑格尔思想的阐释；第二部分专门研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包括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终极的规律性；第三部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辩证法”。“无产阶级革命与无限性的逻辑”一章探讨了垄断资产阶级作为垂死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专政与革命策略、社会主义文明与机会主义模式，“经济学与辩证法”一章探讨了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的现实性与经济学的浪漫主义、土地问题与修正主义等。温斯坦认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消解矛盾的现实性而寻求有限的、僵化的形式上的一致性，这种思维方式自发地贯穿了整个科学思想史。黑格尔的革命性恰恰在于反对并克服教条主义，辩证法作为自觉推动克服僵化科学传统的思维形式，是真正的科学的方法。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思想的合理内核与革命倾向，并使之获得了坚实的唯物主义根基，为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寻求现实的道路。温斯坦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恰恰建立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遮蔽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内在对立，其无法构成解决俄国道路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列宁辩证法的运用体现在对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性质以及俄国现实条件的本质把握，是将黑格尔辩证法运用到俄国现实的范例。

专著《网络（网状）社会：建构的可能策略与必要性》中综合了生物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网状结构理论的社会组织形式^③。本书研究从集中

① Солопов Е.Ф. Диалектика и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Логика синтеза. URSS. 2016.

② Вайнштейн И.Я. Гегель, Маркс, Ленин: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URSS. 2016.

③ Олескин А.В. Сетевое обществ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и возможные стратегии построения. URSS. 2016.

到分散的、基于社会合作的、去中心化的网状结构在人类社会各领域中的前景及其在经济与政治领域中的推进与影响。网状结构相对于其他类型——基于隶属关系的权力集中与竞争战胜合作的（准）市场关系。作者认为，活生生的自然为网状结构的设计员的创造性运用与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组织（范式）。全书包括：网络结构及其在人类社会的具体化；网络结构、经济与社会主义；网络结构、政治、公民社会与精英；网络场景现实化的道路与向网络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

二、历史唯物主义当代阐释

在《对马克思历史观的再思考》一文中，斯莱文试图重新确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立场。^① 斯莱文指出，全球革命链条席卷了阿拉伯、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出现大规模抗议运动，对于现代世界的危机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作出科学解释与回应，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恰恰表现在无力应对历史—现实中各种变化。至少存在两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诠释，其中之一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或未来必然达到的世界图景；另一种则是向着实证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退却，上述两种倾向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形而上学（非辩证）或抽象观念的基础上。斯莱文认为，需要澄清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即人类历史是活动的人追求自己目的的结果，每一代人在前人活动的基础上开始自己创造历史的活动，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纵向联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类历史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解放程度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变更而不断增强。马克思所提出的建设性结论，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开端，只有通过“人类解放”这一历史性的活动才能真正消除宗教、社会和国家矛盾的根源。

在重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斯莱文讨论了文明类型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历史的进步方向，马克思主义者与以汤因比、斯宾格勒、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现代“文明论”展开了积极的争论，文明类型及其冲突也成为当代俄罗斯学者寻求民族复兴道路所关注的重要领域。在斯莱文看来，与抽象的文明类型论不同，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

① Б. Славин. Ещё раз о марксистском понимании истори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6. № . 2.

史发展的科学，即将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作为思维的现实性、真理性的基础。物质生产方式决定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人类历史展现为不同类型社会经济形态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斯莱文认为，维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需要在根本上批判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企图以自然范畴或规律作出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解释范式。达尔文主义被马尔萨斯运用于经济领域解释人与自身再生产条件之间的对立冲突，将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在规律。列宁批评波格丹诺夫和谢尔盖·苏沃洛夫试图以自然主义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错误。由于缺乏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立场的坚持，导致机会主义的政治倾向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蔓延，引导欧洲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派，其本质在于放弃了辩证法，代替以客观主义和进化论立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完全否定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性运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西方社会民主党派代表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的基本立场与方法论基础恰恰是实证主义的，他们拒绝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和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与未来趋势。伯恩斯坦对资产阶级社会采取纯粹进化论的解释，他认为工人阶级更倾向于与资产阶级合作而不是斗争，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在实践中实现，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危机将消失、“无产阶级贫困化”被克服、小资产阶级兴起、工人和社会民主党派将在政治中发挥作用，等等。因此他否定以灾变的或革命的形式通过消灭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主张，放弃革命而通过民主改革现有国家机构的方式或途径来解决社会和阶级矛盾。伯恩斯坦深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而并非科学，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不正确的，应该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建立社会民主党的民族国家。

斯莱文认为，工人阶级坚持国际主义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需要通过实践中的创造性运动对抗资本逻辑全球化的后果。我们看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社会、民族和种族冲突不断升级，中小型企业历史命运受到跨国公司以及国际垄断资本的摧毁，“新俄罗斯”经济体濒临破产的边缘，无法承受与国际寡头资本的竞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伯恩斯坦所诉之于的中小企业或小资产阶级在垄断资本帝国之下，既无法生存，更无法承担其社会改良的重任。卡尔·考茨基尖锐地公开批评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订，并转向了与其相同的立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放弃一贯的国际主义，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思

想以及布尔什维克政策的第一个批评家。在社会历史与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问题上，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共同立场在于：首先，他们放弃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立场，取而代之实证主义哲学。这并非巧合，因为两者都认同并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将社会生活等同于自然现象。罗莎·卢森堡以最激进的方式批评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的政治立场，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处地位的问题。罗莎·卢森堡批评伯恩斯坦，指出其历史进化论以及从资产阶级社会自然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批判考茨基的意见，罗莎·卢森堡认为，考茨基常常忘记了历史是由为美好生活而斗争的人民群众所创造，强调历史的辩证法是通过人的活动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斯莱文认为，明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方法论，需要驱逐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自然主义与实证主义倾向。历史的辩证法意味着，工人阶级在人类社会及其政党斗争中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自觉的、主体性角色，从而开辟人类发展的新时代。

历史唯物主义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文明类型理论是近年来学界比较重视的研究领域，尤其对于分析俄罗斯独特的发展道路与文明样式而言具有比较意义。布兹加林认为，文明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社会哲学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学术争论，而且是方法论范式的冲突，即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非西方国家需要通过理论方法建构探索新文明的类型，舍甫琴科基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深入探讨了广泛运用于分析历史进程的文明形态与历史道路问题。^① 舍甫琴科指出，通过世界体系理论实现历史阶段与文明形态相结合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是极其必要的，寻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找到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方法，能够更加深刻地揭示 21 世纪历史进程的复杂性逻辑，从而克服对马克思历史道路单线发的解释模式。现代文明作为具有普适性的意识形态，就本质而言，意味着西欧文化的民族发展的高度，即欧洲中心主义。对于俄罗斯所形成的独特的历史道路以及欧亚主义而言，外部附加或接合的方式并不能够使其完成向现代文明形态转型，反而会导致与本土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沃勒斯坦、阿明与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对马克思历史阶段理论形成了必要的丰富和补充，尤其对于解释特殊民族国家的历

① Шевченко В.Н.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подход под огнем критик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6. № . 2.

史道路与现实状况。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了中心和边缘的区分系统，中心是一系列紧密互动的欧洲国家，与外围国家建立了贸易和金融联系、国际（国家间）的社会分工，边缘对于中心而言成为必要的存在，他们并没有追赶与升级，外围资本主义是依赖和欠发达的资本主义，没有独立的发展潜力，陷入到发展的恶性循环。对于俄罗斯而言，承认其无法成为西方文明的特异性，首先需要完成现代化的任务，积极去除资本主义社会将主要基于创造性活动。然后，我们可以谈论后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自上而下建设社会主义，而只能通过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内部发展来实现。

H. 兹洛宾讨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历史过程的两重“逻辑”。^①长期以来学者们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争议，理想主义者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规律作为自然必然性的规律。然而马克思相当严格地使用术语“历史性的”，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发展以及人作为历史主体的承担。将“自然历史”解释为“自然的”是错误，因为它排除了人在历史中的存在，人被社会经济结构的强制性逻辑所规定，剥夺了人的独特性、利益、愿望、文化和心理，等等。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自然必然性的客观规律与独立的个体意志之间的辩证。这意味着需要有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分析方法论，对不同历史阶段人类活动的社会、政治和精神及其心态等进行分析，从而克服历史文化中个人的现实发展与活动方式的抽象化倾向。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表现为历史哲学：（1）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不依赖于人的意志和意识；（2）人作为创造自己的历史主体（历史无非是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因此，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建立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在自然历史进程中，人类活动从客观上依赖于先前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作为既得性的生产力。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建立在人类创造性活动的连续性的基础上。

H. 兹洛宾最后指出，现代文明标志着人类历史内在逻辑的危机。以社会发展为中心意味着人类历史主体意识的形成，即克服社会发展的自发性，然而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个人的利益、价值观和人类理想，全球化进程自我解体的性质潜在地植根于关于人类历史这一假设之中，即人作为创造性活动的主体构成

^① Н. Злобин. Коммунизм как культура.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6. № .2.

了对自然的支配地位，同时也割裂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的连续性。现代文明在经济、环境、人口、道德等领域的危机日益加剧，俄罗斯面临再次成为世界体系中“最薄弱环节”的危险，因此需要有意识地寻求克服全球危机的路径，成为当今迫切之现实。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兴

布兹加林在《〈资本论〉与 21 世纪的问题》中探讨当代资本主义新矛盾与新趋势，总结了近年来左翼学者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① 布兹加林指出，针对后期资本主义所发生的一系列转变，如商品生产与消费；货币的本质；劳动的新形式；知识经济；周期性；金融资本；政府的作用；等等。《资本论》研究的关键内容发生了变化，学者们或者在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研究帝国主义的当代形式，或者基于后苏联空间提出一系列新范畴，包括苏联解体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不否认针对后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回应，但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所贯彻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并未获得阐释与适用。戴维·哈维基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研究空间理论，其目的在于展示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所建立的“中心和外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决定资本的空间运动。安德烈·高兹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变化，知识资本主义的概念着重于人类知识的普遍权力。一方面，资本深化了对劳动的剥削，它不仅在工作场所而且在闲暇时间的活动；另一方面，在知识生产领域形成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先决条件。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认为，重点并非单纯的知识与信息生产，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变化导致了新的剥削形式出现，即“高科技资本主义”。上述研究提示出了后期资本主义劳动—资本关系的新形式与新矛盾，生产力以及公共生活领域的深刻转变。然而上述努力普遍缺乏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辩证的方法论，需要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层次，反映现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状态与动态演变。

布兹加林认为，当今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话语”，重新阐释 19 世纪的伟大思想家的方法论遗产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Бузгалин. «Капитал»-XXI. Прологомены.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6. №. 2.

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苏联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想遗产体现在伊利延科夫对《资本论》的研究中，对马克思方法论系统化创新是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向。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呈现后期资本主义在商品、货币、资本、再生产关系等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转变以及内在可能与发展，在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参照马克思分析劳动从属于资本的方法，揭示后期资本主义特殊类型生产关系形成的社会和经济机制，从而发现后期资本主义的具体矛盾及其内在限制。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当代状态的研究，其方法论问题上最重要和最困难的，在于如何把握其内在趋势的、质的转化，即后期资本主义社会非线性的矛盾运动以及辩证过程，其主要特征在于社会时空的网络化以及人类协同的社会创造性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网络市场、虚拟货币、创造性工人等成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和结构新原则，这必然会导致“双重没落”：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虚拟形式及其拜物教。

布兹加林认为，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优势的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新自由主义立场，导致了经济帝国主义。20世纪以来，人类已进入非线性（社会时间）和不均匀时代（社会空间）转型，“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衰落与社会主义复兴过程同步展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理论扩张与实践发展的负面影响充分暴露出来，导致了社会生活与人道主义研究的没落与匮乏。因此，重新回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基础上，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建立《资本论》新的范畴体系把握全球资本主义的当代状况，即资本的全球霸权和它的极限。布兹加林梳理了从马克思到列宁、罗莎·卢森堡等学者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以及内在矛盾的思想史与社会史。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要变化：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显著的社会结构性调整，劳动力向服务行业溢出，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与跨国资本同步发展，从而导致产业资本国家对出口以及廉价劳动力的依赖，信息技术革命为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扩张创建了前提条件。与这一过程同步展开的是市场化原则的扩张，资本在广度（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深度（人类社会生活、文化、自然、情感等各方面渗透）上的霸权主义。在总体上构成了“后期资本主义”的独特表象，即新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否定要素的生成与积累之间的张力，“后期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于它的对立面而存在。

布兹加林将商品生产与价值体系作为《资本论》的基本范畴，主张展开

对商品和货币的新性质的研究，指出资本逻辑驱动下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进程，在根本上依循其自身的内在准则重新塑造社会价值系统。创造性的活劳动本身作为社会必要活动，然而劳动活动的市场化使其成为被资本吸收的对象，现代化进程使技术、土地以及货币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和扩张，并不断破坏自我价值而重塑价值体系。因此不理解商品生产和价值体系的变化就不能完全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关系的演变。社会化与网络组织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自我分离和原子化趋势、企业操纵和政府监管的冲突、创意活动与拟仿市场的发展，上述相互矛盾的趋势破坏并瓦解了使用价值本身，限制了其功能发挥。货币的市场化导致其供应量超出商品流通的需要，虚拟金融资本的扩张与积累超出了实体经济承受的范围。货币供应量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转变，成为有意识地控制和操纵经济系统的工具，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越来越依赖国家权力的调节功能。后期资本主义调节重心向货币和资本市场转移，金融资本获得统治权力，发挥了资本扩张的积极作用，通过金融领域的创新转移并消除实体经济部门资本过度积累的矛盾。货币体系作为虚拟资本的运作的产物，货币价值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在生产系统中被释放出来。

在商品与货币性质的基础上，布兹加林讨论了全球经济中资本—劳动的关系演进：相对于中心而言，处于边缘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处于典型欧洲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其雇佣关系表现为半人身依附关系；工业无产阶级作为外围或半边缘国家的“古典”雇佣形式；利用垄断地位向周边国家转移过剩资本投资；金融资本对于实体经济拥有实际上的霸权；对创造性活动的剥削形成并建构着新的劳资关系。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重要的特征在于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斗争。进入 20 世纪中叶，两者之间的妥协导致资本收入减少以及劳动所得份额的增加，然而这种妥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对于后期资本主义而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扩张导致再次出现强资本弱劳动的状况。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方式不仅仅体现为占有剩余劳动和延长工作时间，而是形成了通过知识劳动或者创意劳动的新的剥削和占有形式，人力资本从属于商品关系，资本诉之于对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寄生性吸纳，深入改造并重塑文化、艺术、教育、社会等等领域，“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体现了人类被整合到整个商业化系统中。在“经济帝国主义”方法论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动下，市场作为“无形”的手以及对于“资本”无批判的自然主义倾向，成为保守的力量。

布兹加林在总结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当代分析体系。基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概念与假设，确定了全球化的矛盾体系，包括众所周知的（全球不平等——全球市场与国家、国家调控在社会领域之间的矛盾）框架，也包括新的分析维度，如全球资本组织的集中和扩散、社会化进程的网络化、碎片化与原子化，即全球化的矛盾过程与结构，上述矛盾的后果是一系列全球暴力关系与张力，如非对称战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操纵、强化剥夺性积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与未来、经济制度的萌芽等。布兹加林认为，当今迫切的现实问题在于，解剖后期资本主义的特质与俄罗斯的突性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具有矛盾的特殊性，即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残余与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共生，揭示这些具体现象的政治和经济内容。后期资本主义的现象表现为社会分化程度高、资本倾向于炫耀性消费而非积累等，典型的半边缘经济体呈现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官僚主义与产业资本主义模式的微妙结合，在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方面倾向于非经济的强制性手段，使俄罗斯经济体系陷入资本积累能源依赖性陷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为解决俄罗斯的双重困境提供了优先发展战略。其核心理念在于推动“必然王国”以非线性的发展路径向“自由王国”转变，将教育作为新经济体系优先发展的动力，即提高人的素质以及创造力，在此基础上，使国家通过社会改良主义的方式形成良性的经济系统，以达到“北欧”或“中心”模式国家的发展水平。

皮科吉在《皮凯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一文中对马克思与皮凯蒂的资本观及其理论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位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前提与研究方法分析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对于人类未来所造成的可能性后果，马克思更感兴趣的是实践的理论，而皮凯蒂更感兴趣的则是实践本身。^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证实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衰落与崩溃，认为其不可持续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不可避免的、体系内部的自我瓦解与自我摧毁，即平均利润率不断降低的趋势。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却认为，马克思基于古典主义经济学作出的判断还为时过早，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的哲学演绎与皮凯蒂依据经验主义所作出的结论表面上是相悖的。

皮科吉认为，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一直以来是存在争议的，首先遭

① Автор Рокмор Т. Пикетти, марксист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и закон тенденции нормы прибыли к понижению.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6. № . 6.

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内部批判。现代经济理论自亚当·斯密开始主要针对工业资本主义短期或中期的可持续性，马克思提供了一个长时段历史分析的替代方案，以非经济学方法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进行分析。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并同样反对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将其作为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的理论基础。然而卢森堡从未将资本主义的自我解体作为历史必然规律，而是强调资本主义体系依赖于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存在，这表明存在着一个自然极限或终点，在缺乏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前提下资本主义体系必然走向崩溃。但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反对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并认为资本积累会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希法亭、考茨基、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拒绝历史必然性的简单结论。而现代经济理论与经验事实对马克思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挑战表现在三个方面：(1) 平均利润率增长速度上升，生产力提高，更少的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2) 平均利润率是无法预测的，因为它取决于具体的经济条件，如法国经济未能在2014—2015年间实现持续增长，其部分原因在于欧盟内部采取紧缩措施，而非通过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3) 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因为在实践中投资者总是迅速地转向新的机遇与新的需求。和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相反，置盐理论认为，除非实际工资率有足够的提升，否则资本家引进技术创新不会降低一般利润率，基本行业技术创新会提高一般利润率，而非基本品行业技术创新对一般利润率水平没有影响。直观地说，只要劳动者增加工资的努力失败，资产阶级便能够提高利润率。技术创新必然降低生产成本，促使其他成本下降和利润增长，雇主有经济诱因维持甚至降低工人的工资水平。置盐理论有时被作为新李嘉图主义，即利润率下降可能仅仅是由于增加了工资。类似观点体现在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在皮凯蒂看来，马克思的观点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它没有明确地给出一个严谨的数学模型和数据分析。

皮科吉指出，马克思这一论断的确没有建立明确可行的前提假设，尽管他的准备性笔记和著作庞大，但表达方式却比较零碎，无法呈现严谨的理论体系。在皮凯蒂看来，马克思的分析适合于缺乏结构性增长（对于资本积累是必要的）的情况，但是马克思本人对于通过不断提高生产力的结构性增长概念知之甚少。他建议，恢复并展开对马克思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的实证基础的争论。皮凯蒂的著作影响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皮凯蒂作为当代经济

学家，善于运用数学方法和数据分析，而马克思只是偶尔使用数学方法。就事实而言，平均利润率降低趋势并未得到经济数据的支撑，皮凯蒂认为这一点对于马克思的论断而言可能是致命的，现代经济学拒绝马克思所依循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立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要求解释经济现象，而且追求改变现实，即在实践中改变世界的革命性理论。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部瓦解趋势的判断，是基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解决方案，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就具有了重要的破坏意义，它意味着资本主义所追求的长期稳定性的内在基础是不稳定的；由于平均利润率下降是劳动价值论的明显后果，从而也损害了劳动价值论本身，与资本主义的劳动伦理和社会公正原则背道而驰。马克思对人类的未来的乐观主义恰恰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未来前景的悲观情绪。皮凯蒂与之相反，并不怀疑资本主义缺乏足够的利润空间，现代工业社会甚至比人们预期的更加繁荣，资本主义体系征候的原因反而在于它太成功了。马克思与皮凯蒂相同的立场在于，拒绝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福祉，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财富分配不均衡与不公平。马克思基于道德与经济的双重立场批判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并以利润形式剥夺活劳动来实现资本积累。与马克思不同，皮凯蒂不对生产过程做道德评价，皮凯蒂通过对长期以来欧美财富收入数据的研究表明，市场永远解决不了不平等问题，市场机制越完善，资本收益率就越会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贫富差距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增加，从而增加了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紧张与对抗，最终会导致反民主的金融和政治寡头，破坏个人自由和现代民主社会基础。

皮科吉进一步指出，皮凯蒂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上具有不同立场。皮凯蒂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将财富分配重新置于经济学的研究核心，通过数据分析和理论框架揭示了长期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动态过程，财富分配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力量联合作用的产物，它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预见基于必然性逻辑，这意味着马克思是过于乐观甚至错误的。皮科吉在比较皮凯蒂与马克思思想异同的基础上，转向了卢梭的问题。马克思和皮凯蒂之间观点的本质区别在于对人类福祉的判断，这一主题存在于整个西方传统，贯穿全部西方文明。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卢梭把自由作为人类行动的根基，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了卢梭的问题。马克思揭示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通过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类的福祉。皮凯蒂不

同于马克思、黑格尔，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几乎没有可行性的过渡路径，在实践中人类的福祉要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或者必须完全放弃，皮凯蒂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愿景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四、20 世纪初俄国思想史研究

俄罗斯学界近年来比较重视对 20 世纪俄国思想史的研究，原因在于 20 世纪初沙皇俄国对于探索社会秩序的现代化尝试与俄罗斯当下状况具有历史的相似性：沙皇俄国在改革后走上了赶超发展的现代化之路，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正试图进入后工业文明发展阶段，努力构建符合当今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现实的现代化制度。在 20 世纪初俄国政治斗争的各方势力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主张与现实策略错综复杂且充满了矛盾冲突，虽然十月革命表面上作为一切思想冲突的历史终结，然而苏联解体后被遮蔽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暴露出来，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矛盾、政治话语斗争具有惊人相似性，学者们认为，需要回到俄罗斯思想的精神传统与历史真理中寻找根源。

在《澄清概念：俄罗斯思想在 20 世纪初的政治与道德话语争论》一文中，朱可夫基于沙皇俄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的复杂历史境遇，对俄国 1905 年革命前后左、中、右派的政治理论及其道德准则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比较。^① 朱可夫认为，俄罗斯文化的形而上学性质决定了自身政治实践的伦理向度，20 世纪早期哲学家与政治学家发起了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政治责任问题上的讨论；俄国思想家试图给革命以道德评价，澄清“爱国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自由”、“民主”的概念。俄罗斯知识阶层依循历史真理的准则，反对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话语中抽象的自由精神和道德原则。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基本道德问题集中在“俄罗斯的命运”以及历史选择这一核心主题上。

朱可夫首先讨论了在俄罗斯政治伦理问题上历史真理与政治真理之间的哲学辩论。20 世纪初俄国在激进的社会动荡与冲突中走上了君主立宪之路，其中发挥作用的反对势力包括右翼自由主义与左翼社会民主主义。1906 年中

① О.А. Жукова.Проясняя поня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ораль и борьба дискурсов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6. № 1.

间立宪派采取了和平重建的方式，推动尼古拉二世政府公布了宪法基本法、成立国家杜马立法议会与实行多党制。然而历史真理与政治真理是背离的，历史的吊诡在于，中间派的改革方案虽然在政策文件中规定了俄罗斯社会的民主性质，但就实施而言缺乏政治活动的手段。俄罗斯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实现政治生活中的道德重建以及社会关系的协调和解，即将现代公民国家融入民族文化（以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及精神思想、政治传统中。俄罗斯民族历史性实践在精神和政治层面的内在对立尚未解决，对于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古老俄罗斯和现代元素之间的分裂而言，必然要追溯到 20 世纪初的思想冲突。

俄罗斯人生活在政治、道德和形而上层面，俄国思想家正是基于上述三个维度为俄国革命制定指定方向。朱可夫强调在基本道德和政治概念的历史语境与民族精神中澄清其思想作品的重要性，20 世纪 20 年代的俄罗斯侨民在流亡欧洲期间并未放弃革命的诉求，在社会革命和内战的废墟上与布尔什维克争夺社会思想的话语权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别尔嘉耶夫、伊林、克拉柯夫、米留可夫、司徒卢威等著名作家和“俄罗斯流亡者”在思想争论中不但没有失去清晰度和紧迫感，而且还承担起对特殊道德意义上的历史罪责、民族精神和政治责任的反思重任。朱可夫着重研究了米留可夫与司徒卢威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中间路线的思想转变，认为这一转变恰恰源自于他们对俄罗斯历史传统以及文化精神的深刻洞察。

作为“俄罗斯侨民”的米留可夫在流亡期间试图再次寻求中间道路，既反对复辟沙皇君主制，要求放弃旧有的政治立场，并以民主俄国的方法取代旧有的统治阶级习惯和方法；同时认为不可能从外部反对布尔什维克，但是苏维埃政权内部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可以通过社会民主党的联合加剧俄国内部斗争的心理基础，进而从内部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治斗争现象背后更为深刻的情感基础在于俄罗斯民族情感与国家认同。米留可夫的国族意识力图建立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内在统一，因为民族感情既不违背国家的生活，相反本身就是其发展的结果和因素，与此同时，米留可夫要求区分国家和民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边界，避免情绪性的爱国主义以及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司徒卢威一直是完美的自由文化理念倡导者，坚持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于俄罗斯传统文化与“个人生活”理念阐述自由思想，寻求自由文化与俄罗斯宗教传统价值观的融合。司徒卢威主张将自由

主义和爱国主义合成在智力和政治经验之中，放弃欧洲基督教文化的抽象的普遍性，转向拥护斯托雷平改革。在解放运动阵营为俄罗斯国家的宪政体制战斗，司徒卢威已经在 1906 年完全意识到国家和民族文化最大的危险成为“右翼的敌人”和“左翼的敌人”。在俄罗斯侨民中的左翼和右翼继续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就何谓真正的爱国者这一问题形成了两个标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和政治道德准则。政治上权宜之计的核心在于：什么样的内外政策与俄罗斯的民族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政治道德准则则回答另一个问题，即政治与精神文化领域以及公共生活的具体行动所应遵循的内在真理是什么？俄罗斯文明的内在气质构成了民族国家结构和社会参与者选择政治行为与政权类型的思想基础，任何一种选择都背负着历史、俄罗斯、社会、人与神的道德责任。在流亡者看来，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验、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念塑造了政治行为的道德和伦理内容。

朱可夫在 20 世纪初俄国思想家的困顿中，深刻揭示了俄国政治生活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冲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建立新型资本主义关系的系统化经济体制，同时要求社会关系的组织原则与政治制度重组。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价值观的此消彼长形成了 20 世纪初政府权力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张力，公民意识的觉醒；经济、医疗、科研、慈善、工业、教育等社会领域的进步；文艺形式、妇女运动和妇女组织的发展，构成了俄罗斯社会生活内部的自我组织经验，即个人学习如何对社会负责以及创造自我价值，旨在超越国家的传统主义以及宗法道德的约束。在 20 世纪初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内部结构冲突是非均衡的，即社会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特质的道德观念的差异性与矛盾性，尤其是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和政府行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政府活动趋向于保守主义和保护政策，与社会活力的释放产生了冲突。立宪政府充满了对社会失去控制的恐惧，渴望保持传统主义社会结构导致了对社会力量的制约。改革后的俄罗斯政治文化在其道德观念和社会关系的主体政治行为要求个人的政治活动依循于对传统的、习惯性的社会秩序与道德判断的服务、责任、忠诚。

初期“激进主义政治文化”形成了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相对抗的不同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在政治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1905 年俄国第一次杜马议会试图解决上述尖锐矛盾，旨在超越右翼与亲政府的激进左派之间的斗争。司徒卢威基于“政治自由”立场反对简单地革除一切，而倡导依赖国

家历史和文化传统通过君主立宪制来实现政治自由。执政精英和新的社会政治力量表现出不同的政治道德与行为模式，关于不同道德准则与政治主题的争论构成了 20 世纪初俄罗斯政治文化状态的基本特征。然而，统治精英出于自我保护以及对革命的恐惧，竭力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导致其改革的政治行为失信于普遍的道德法则，阻碍了自身与社会进步力量之间的合作，逃避现实，道德腐败。斯托雷平改革只是在特殊政治时刻的道德技巧上与司徒卢威的政治自由在某种意义重合，作为统治阶层在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作为适度的宽松，其保守的社会道德原则拒绝接受革命党人的政治行为。对于俄罗斯贵族和知识阶层而言，俄罗斯古典基督教文化及其传统的道德理想是尽责、无私、正直、诚实、社会服务。统治官僚和公众人物进入公共生活，则需要重新树立正义、义务、责任、荣誉、良心、团结等道德与法律的自我控制原则。然而上述原则受到政治局势的压力，往往会变成它的反面，企图保留或夺取政权。

朱可夫认为，20 世纪初知识分子所追寻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政治现象、政治立场以及政治行为模式是可能的？如何为政治生活确立坚实的道德基础？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在政治道德包含明确的（意识形态）或隐藏的（直观）前提，即在文化确定性或宗教认同中的道德理想和价值信念，其构成了政治行为的历史真理。在 20 世纪初的反动政策和左翼革命形成一个悲剧性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着两个方面冲突：首先，激进的自由主义使追求立宪的中间派失去了存在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基础；其次，激进的政治力量缺少道德的约束与反思，激进的自由主义联合布尔什维主义释放了破坏性和反动性。从浪漫的民粹主义到布尔什维主义这一表述敏锐地刻画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斗争的道德和伦理原则，揭示民粹主义的历史蜕变，这是一个悲剧性的转变，即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道德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对立，使革命失去了对道德反思和政治伦理的理解，释放的最可怕结果变成了骚乱的暴徒，在这种情况下，“黑”与“红”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司徒卢威认为，俄罗斯政治伦理的核心问题在于，需要依循历史的真理，而非抽象的政治真理，这种道德和政治选择，一旦触犯，所有革命的根基都是极其不稳固和危险的。而今天，因为我们相信，澄清 20 世纪早期的俄罗斯历史的戏剧性事件，通过对政治运动背后的道德与观念的话语分析，才有可能克服历史真理与政治真理之间的冲突。

五、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对于苏联时期社会主义模式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矛盾分析以及根源解剖，仍然是当代俄罗斯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

《光与影（20世纪60年代的“解冻”的矛盾与潜力）》一文采取独特的分析视角重新确立了苏联“发达社会主义”历史分期的标准，对苏联“解冻”时期的社会状况及其内在矛盾进行了深入研究。^①布兹加林认为，虽然苏联时代已经远离“发达社会主义”，然而人们对其性质、矛盾和潜力具有更大的兴趣。与实践相悖的是，苏联公民最怀念的先是20世纪70年代的“停滞”时期，因为这一阶段处于相对平静和舒适的生活。“发达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形式在“解冻”和“停滞”的不同阶段上存在显著差异。必须重新为“发达社会主义”历史分期的演变确立系统的标准，即把握住导致社会主义“突变”的关键性矛盾：一方面试图非线性地进入自由王国，通过创造活动实现社会主义的团结和斗争；另一方面却被异化关系所阻碍（教育、艺术、社会工作、科学领域创造性活动的发展与常规工业劳动的统治）。“发达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发端于上述根本矛盾的两极对立，即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一方面社会热情激增，在文化、教育、社会工作、基层公民协会产生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和极权独裁（上层官僚主义与底层市民化的冲突以及极为不利的外部条件）。“新经济政策”无法解决上述矛盾导致了第二阶段两极的形成，20世纪30—50年代以及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在困境中呈现出两个相反的倾向：一是对任何异议、政治自由的暴力镇压；二是英雄主义情绪高涨和社会创造力活跃。“解冻”恰恰是企图解决这一矛盾，推动政治和经济改革与社会、文化、科学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内在融合与统一协调。

在布兹加林看来，“解冻”时期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在于社会、科学以及文化领域公民意识的觉醒、革命情绪与自由思想的复兴，部分地恢复公民的创造性活动的社会空间。出现了自上而下的对党和国家专政权力的限制，尤其是对特权阶层利益的限制，物质基础、科学技术、不同形式的社会自组织、文化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Бузгалин. Советский полдень: свет и тени (Заметки о потенциале 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х «оттепели» 1960-х)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6. №3.

艺术获得了加速度发展。“全民国家”的政治改革将国家职能交给社会组织，吸引公民直接地经常地参加公共事务和社会活动，把生产工作和国家事务管理结合起来，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不同形式的社会自组织的加速度发展。尽管改革具有矛盾性和局限性，“解冻”对于苏联社会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其通过释放群众追求“自由王国”的意愿来促进社会主义现实运动的充分展开。1950—1960年苏联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技术基础发展，带来了苏联历史上乃至世界范围经济增长速度的最高成就，被认为最成功的第八个五年计划（1965—1970年）恰恰得益于“解冻”所产生的惯性，这一时期在经济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即对国家经济结构实行分权制度和非官僚主义化，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大量资源转移到了公众设施建设，解决了民众诸多迫切的现实生活问题。“解冻”主要成就就在于关注文化的优先发展、公众的创造性活动对国家事务以及社会管理的参与，为苏联的精神复苏创造了前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迅速增长的公众情绪，即劳动的、创造的热情所推动的实际解放进程。在苏联文化解放趋势的推动下，新的价值观开始形成，即普遍的集体道德和艺术理想，重塑了“现实社会主义”新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新人的社会理想形式，使民主、法治、人权等成为现实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解冻时期的反面教训，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整体框架上仍然保持独裁统治，专制条件下的这种实践在各个领域强化了意识形态控制；资源在国内仍集中在特权阶层手中，解冻所释放的社会创造活力的萌芽最终转变为异化的、反常的形式，转向效率下滑和质变，“短缺经济”成为嵌入苏维埃制度基础的一颗定时炸弹。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了50年代后期文化、科学技术、社会创造力等所有元素危机。这种改革制度的失败作为转折点，标志着“停滞”时期的开始。

布兹加林于历史与逻辑内在统一的维度，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内在矛盾的展开过程。布兹加林将苏联模式称为“突变”社会主义，由于一系列内、外因素的矛盾运动导致了以“现实社会主义”为开端向不同方向发展的非线性历史进程。“现实社会主义”作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初级社会发展形式，其一方面在科学、教育、艺术等领域解放了人的社会创造性，社会革命所激发的个体主体性创造活力使超越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社会公正、苏联文化精神处于萌芽状态；另一方面由于极权统治与官僚主义在现实中对群众社会创造性与新事物萌芽的压

制与排挤，致使其偏离了最初的发展轨迹。因此，关于“现实社会主义”演变的分期可以根据这一根本性矛盾的辩证运动进行分析和界定。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作为“现实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矛盾尖锐化的开端，强大的社会热情带来了文化、教育、社会工作的巨大成就，基层民主运动取得了进步与发展，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极权独裁统治终结了列宁试图解决苏联体制内在矛盾的努力，限制了建立新社会关系的趋势，顶层的官僚化和底层的解放运动以及极为不利的外部条件，成为这一阶段苏联的现实矛盾与张力。“新经济政策”无法解决上述矛盾导致了第二阶段两极困境的形成，即20世纪30—50年代，包括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呈现出两极强烈对立倾向：一方面暴力镇压，压制政治自由与异议；另一方面则是在革命的乌托邦理想与英雄主义驱动下底层民众社会创造力最大程度发挥的现实过程。“解冻”企图再一次解决苏联体制的根本性矛盾，然而却治标不治本，无法为社会、文化、科学和技术创造力提供适当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组织形式。然而“解冻”时期的历史经验却是不能被忽视的，在限制官僚主义的方向上进行了有限范围内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布兹加林娜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文艺批评理论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以及历史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苏联体制社会与文化二重性矛盾所导致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① 由于苏联体制的过渡性质使社会与人的存在向两个相反状态发展：一方面，个体的创造性从现实权力的异化中被释放出来（通过社会创造活动），即人的解放趋势；另一方面，个人主体性被宗法专制传统的异化形式，即为斯大林主义所压制。个体解放与专制压制的紧密交织形成了苏联社会现实的独特张力，构成了苏联历史与文化的主题特色与悲剧性。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瓦解了社会等级制度以及宗法传统，通过社会制度的基础性变革确立了个体存在的主体性原则，这是一个一经展开就不可逆转的个体社会化存在形式的淬炼过程。个人作为历史主体参与到对抗各种异化力量的现实解放斗争中，然而宗法专制传统在苏联时期以官僚主义的形式被恢复与发展，个人只能作为党和国家的工具和手段而存在。苏联时期文化精神的内在矛盾表现为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性（往往相互冲突的），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是

^① Людмила Булавка-Бузгалина. Разотчуждение как конкретно-всеобщая основа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СССР.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6. №2.

导致其文化艺术双重性质的前提。

在布兹加林娜看来，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意味着新类型社会的诞生，是世界历史矛盾总爆发的一种表现，重塑人的社会存在形式构成苏联文化的根本核心，社会创造力的本质是个人的自我确立以及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克服外部权力对于（国家、市场力量以及宗法意识等）人的支配，因此它是人的异化以及异化的积极扬弃。从事创造性活动的革命性的个人，是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相适应的主体存在，在群众的社会创造性之外不可能确立真正的主体性。然而这一具有外生性的精神文化产生于世界革命运动的实践，与苏联现实的解放趋势产生了矛盾冲突。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人口的80%以上是文盲，缺乏革命主体的文化潜力意味着，社会创造的历史性实践处于现实的矛盾和对立之中，往往会导致社会悲剧性的后果。社会创造性活动客观上释放个人力量，变成了随意性与热情冲动。20世纪20年代社会与文化创造力的释放，使苏联解放趋势中的精神文化成为特殊形式的乌托邦理想，可以将其定义为通过特殊的社会创造性活动扬弃异化的具体的、历史的观念形式，即“物化”在特定艺术现象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方法，要求艺术家以社会主义精神将艺术阐释中的现实性、具体历史性革命进程与重塑个体意识充分结合起来。

布兹加林娜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味着对现实以及对个体自我意识的双重否定，即对于保守的、敌对因素的根本改造以及对个体自我革命精神的重塑。它的功能在于，一方面反映阶级矛盾斗争，另一方面展现从“必然王国”转向“自由王国”的新（无产阶级）文化精神，作为在特殊条件下反抗精神的载体承担着对其他思想体系的引领、改造以及激励功能。然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称为“官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在包含着艺术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的对立。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的政治忠诚度与社会服务精神，艺术创造的活力和范围被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所束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承载着解决现实矛盾的功能，即重塑个体的特定社会角色。苏联文化是从社会（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其本质在于克服具体的、历史的异化形式，从现实矛盾的发展出发，这一艺术逻辑强调艺术家对生活真实过程的艺术再现，然而却只是被局限在苏联体制乌托邦理想的范围内，这与苏联文化本身所承载的具体的现实运动原则是相悖的，苏联文化功能的多样性以及内在冲突恰恰是由于文化、历史主题与主体性原则之间的结合。此外，苏联文化本身是理想的，可以

允许现实的矛盾形式，然而历史表明其危险性不在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却在于这一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并以文学艺术的理想化形式被掩饰和遮蔽了。苏联文化寻求突破“必然王国”的制约转向现实的“自由王国”，其本身的内在诉求是毋庸置疑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